

誰是兵家—— 兵家的代表及其源流考

Who is Militarism? Representative and source of militarism

海軍上校 余一鳴

提 要：

兵家是門學科還是學派？從有信史以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透過歷史文獻的耙梳，去分析兵家到底是不是個學派。本文分析發現，兵家早期指的是一種與軍事相關的專業知識，但到後來發展成以富國強兵為核心的學術派別。其中以《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及《尉繚子》最能代表兵家的學術觀點。

關鍵詞：諸子源流、軍事專業主義、儒體兵用

Abstract

Is the militarism discipline or school? While the process of peer reviewing journal articles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has been extensively researched, the problem is still in controversy. We employed a literature analysis in this stud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ilitarism means a kind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related to military affairs Pre-Qin period, it was developed into the academic group with making one's country rich and building up its military might at the core into late. "The Art of War"; "Wu Ze of War" and "Wein-Liaur of War"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Keywords: Xian-Qin Zhuzi' s origins;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Confucianism for essence militarism for function

壹、前言

說到兵家，大概最先聯想到的是兵學家，內涵泛指軍事家、戰略家或直接指的就是軍人。因此，兵家一詞大概有幾種內涵，一

種以軍事做為職業的軍人，另一種是指從事軍事研究的專業學者。不過本文所指的兵家既不是要探討軍人這個職業，也不是要探討從軍事研究有哪些學術派別。而是要探討兵家是不是個學術派別，如果它是個學術派別

，那麼哪些學者的觀點最足以代表兵家的學說。因此，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兵家是不是一個學派，還是單純的只能稱的上是個職業。其次，如果兵家是個學派或不能稱得上是個學派，那麼它為什麼能夠稱得上是個學派，或為什麼不能成為一個學派。再其次是如果兵家是個學派，那麼最能代表兵學學術思想除了孫武之外還有哪些人，或哪些兵學著作最足以代表兵家的思想內涵。本文即在這樣的研究旨趣指引下，開展對兵家源流的考證，企圖從以往的文獻之中，追尋可靠的答案。

根據班固編目的觀點，諸子百家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十家，即是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其中小說家不入流，構成「九流十家」。班固認為諸子百家之中「凡諸子百八十九家」能「自立其說，言之成理」，但真正能「有其統緒，發為著述」僅這十家。換言之，「兵家」雖然稱為家，但就班固的看法充其量只算「自立其說，言之成理」但尚未具備「成一家之言」的格局。然而，傅斯年則從編目學的角度分析，認為兵家雖然未被班固納入「九流十家」之列，這是由於兵家著作內容繁多，依照實際編目需要另立篇目以系統性的說明。因此，兵家未列入諸子之列，並不代表不能成一家之言。就兵學的內涵及編目原則，兵家不僅已達「自立其說，言之成理」，而且就其內容而言已達「有其統緒、發為著述」應該被視為學派，而不僅是個學科。同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

史新編》將兵家列入其中¹，可見兵家應該能被視為學派，而不僅僅是門學科的分類。

如果兵家是種學術派別，那麼誰足以代表兵家，更精確的說，誰的兵書或著述可以代表兵家思想。由於中國傳統兵學文化受漢代「獨尊儒術」的政策影響，兵學產生儒家化傾向。近代的學者認為兵學受到儒家社會化的歷史氛圍與社會結構，導致兵學傾向儒家仁義道德的方向發展，雖然有助於補充兵家在這方面的不足，但儒家化使得兵學失去既有的色彩，必須臣服於儒家思想系統下發展²。也就是說，當兵家雜染了儒家的思想，兵家就不再是兵家，它只是以儒家的觀點來闡釋軍事或戰略問題，如此一來便影響後世對兵家思想的理解。因此，當我們要考證兵家的源流或是論證兵家是不是一個學派的同時，誰才是兵家也有必要加以釐清，如此才有助於理解中國兵家的思想內涵。當然，當我們要釐清誰才是兵家這個問題時，其實要探討的是誰的兵學思想才足以代表兵家。

從以上的說明得知，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兵家可以是個學派，而不僅僅是門學科，但這些說法並沒有詳加考證與說明，這使得兵家可以成為一個學派的論點，變的相當薄弱。其次，如果兵家是個學派，那麼班固為什麼沒有將納入「九流十家」之中。如果兵家是個學派，那麼代表兵家的著作有哪些，兵家的思想會不會受到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等？都是本文欲探索的問題。本文即在上述的問題意識下開啟對兵家的探討，期望從文

註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註2：高潤浩，〈以儒統兵：儒學對傳統兵學的統合〉，《中國軍事科學》，第16卷，第1期，2003年，頁122-130。

獻的耙梳過程中，去探討兵家的源流與發展及其代表著作，以彌補以往研究上的缺口。

貳、兵家源流考

要瞭解兵家是不是個學派，必先得瞭解兵家的起源，同時也要瞭解班固的學派分類原則，才可藉此判斷兵學到底是門職業知識，還是門學科或學派。

一、兵家者，古司馬之職

在《孫子兵法》的〈始計篇〉中談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是目前典籍中最早談到「兵家」，而這裏所謂的兵家是指兵學家。兵家一詞到了漢朝大量的出現在史料當中，可以做為考察兵家內涵的重點。例如《淮南子·漢書》中談到「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眾，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眾。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又如《漢書·匈奴傳》「兵家之勝，貴於未戰。」《漢書·敘傳》「兵家之策，惟在不戰。」李桂生認為漢書所指的「兵家」，指用兵者、談兵者與兵法創造者的集合概念³。根據趙國華的考證，兵家思想最早可以上推至黃帝大戰蚩尤，不過因為當時文字不發達，所以沒有留下任何證據。一般認為兵家思想的出現大概最遲到周朝，根據《左傳》當中就曾經記載，西周就已經有《軍政》及《軍志》兩部兵書，但僅散見於各種史料

之中，沒有具體的內容，當然也看不見思想的系統性。一直要到春秋末年《孫子兵法》的問世，兵家的思想才告確立。蘇軾在《孫武論》中做出以下的評論，「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胡應麟也在《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中談到「孫武十三篇為百代談兵之祖。」根據馮友蘭的考證，諸子百家的興起與春秋時期的社會變動脫不了關係，由於社會制度的解放，進而產生百家爭鳴的思想解放，而兵家就在這股社會思潮下發展⁴。

班固曾經考察兵家的源流，在《漢書·藝文志》當中做了如此的說明，「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齊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并作。」因此，一般認為兵家最早是一種職務的分類，出自於掌管軍事國防官員的統稱。此外，班固在《漢書》曾經談到「諸子出於王官」⁵。古代職業與社會結構非常簡單，只有在周王的政治組織當中才有成立專責管理部門。當時春秋戰國的社會背景，能夠被周王聘請擔任某種領域的管理專家，雖然不能說學有專精，但一定具備某些特殊的才能，再加上他們長年的實務工作經驗，必定因專精於某些領域，而形成對事務特定的觀點與累積出一般專業知識。然而，在春秋時期王崗崩解，王

註3：李桂生，〈兵家《尉繚》與雜家《尉繚》關係新探〉，《黃岡師範學院學報》，第26卷，第4期，2006年，頁66-69。

註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頁28-45。

註5：亦有學者（以胡適為代表）反對「王官出於諸子」的說法，但呂學勉認為漢書藝文志將方術、兵書編為一類可以證明。諸子是否出於王官正反說法不一，且個有論據，但目前學界較傾向諸子出於王官的說法。《漢書·藝文志》表示「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司徒在西周時期是掌管教育的員官，羲和是掌星曆的官員，也就是儒家學術思想是源自於教育專業，而陰陽家的學術思想是源自於星象占卦之學。這是「諸子出於王官」的由來。

權沒落後，當周王無力負擔龐大的文官支出，這些學有專精之士只能各謀生活，當他們「下崗」流落民間之後，著書立說就成為他們謀生的工具。也由當時社會規範解體思想開放的時代需求下，專業知識的傳授，必定能吸引一群死忠的擁護者，持續不斷的進行學說的改進與精練，形成一套獨特的學術思想。根據班固的記載，此時，兵家也很可能從軍事專業走向學術性的發展⁶。因此，傅斯年認為專業知識誕生於官府，而春秋時期的私人講學就是在這類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當然這也包含以軍事管理為專業的司馬之官。

其次，在春秋戰國時期「子」是弟子對老師的尊稱，這些思想家的言論被弟子或後人所傳誦，並寫成文字編輯成書，日後變成為一家一派的代表人物，例如：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莊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韓非子；兵家的孫子、吳子等。可見孫武、吳起、尉繚之所以被稱為孫子、吳子及尉繚子是後世弟子對這些人的尊稱。至於孫武等人有沒有像儒家等其他學派學者一樣，開班授徒，在歷史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孫武等人被尊稱為子，最起碼是後世研究孫子、吳子及尉繚子時，認同該學說思想，並將孫武等人尊稱為師，而且自認為是孫子、吳子及尉繚子的門徒。

二、子部的編目原則

中國最早的學派分類，起源於「九流十家」之說，那麼《漢書藝文志》的編輯原則

是什麼，班固是依據什麼樣的觀點將「九流十家」編入諸子之中。根據蔣伯潛的分析，認為《漢書·藝文志》主要依據劉歆的《七略》而來，而劉歆的《七略》是根據劉向的《別錄》的編目方式進行編輯⁷。當時漢成帝命令各部門整現存之書籍、典章，主要依據業管的工作內容而定，光祿大夫劉向整理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書，太史令尹咸整理數術，侍醫李柱國整理方術，最後匯集成《別錄》。而後來刪除七略中的總目錄，這六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就成為後來《漢書·藝文志》編輯的依據。因此李桂生認為《七略》當中之所以將兵書單獨列為《兵書略》，既是出於政治、軍事的實用目的，也是出於兵書數量很多，有必要另立綱目⁸。事實上，早在漢武帝時期，「軍政楊樸摺摭遺逸，紀奏《兵錄》」⁹，就已經出現以兵書為內涵的專業編目。因此《七略》延續這樣的原則，將兵家獨立於諸子的編目之外。

事際上，文武分管設職是官制最早的起點，春秋時期「官分文武」，這種粗略的官職分類，一直到東漢文官與武官更趨明顯，而且加以制度化。文官為司徒、司空和九卿，武官為太尉、將軍和執金吾、諸校尉。就連官員的選任制度也區分為一般科舉及武舉。可見漢書未將兵書列入諸子略之中，雖是基於編目學的考量，而中國的編目學將兵家

註6：班固，《漢書藝文志》。

註7：蔣伯潛，《諸子通考》（臺北市：正中書局，1957）。

註8：李桂生，〈兵家《尉繚》與雜家《尉繚》關係新探〉，前揭書，頁35。

註9：班固，《漢書藝文志》。

不列於諸子之中，實受「文武分職」的分類習慣影響，也就是班固在考量哪些家是否應列入諸子略當中，並不是全然以學派分類為考量，可能還涉及文武分類的習慣。那麼兵家未列入諸子略當中，便不能成為兵家無法被列入學派的證據。

關於「九流十家」與學派、學科及職業知識間的關係，大陸學者李零認為學科是以職業為依託；而學派則帶有「自由學術」的性質，與職業聯繫較弱，源流曲折多變¹⁰。前曾述及，所謂的十家最初都是由管理皇家專業職類而延伸出來的學問，例如儒家出於司徒之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道家出於史官；法家出於理官等，各家源出於職業的分類。根據傅斯年的考證他認為王官初期應該只是門學科，但由於王官流落於民間，這些皇家事務的專業經理人，沒有別的專長只好靠講學與技術專長來謀生，也正好春秋時期開始有了養士與私人講學的風潮，這種專業的技術與經驗，在講學的過程中就慢慢形成一家之言¹¹，成了一種治國或處事的觀點。準此而論，周代軍隊的管理，也必定會孕育出一批專業的軍事人才，根據張磊考證周王擁有一定數量的軍隊，必須要有一批人專業負責這些軍人的管理、訓練、後勤補給及戰爭行動的規劃¹²。同時從《漢書·藝文志》當中就已經發現近千篇的兵書來看，從事軍事專業的人才在當時一定相當多，否則《漢

書·藝文志》當中不可能輯錄那麼多兵書，而這些兵書一定是學有專長或長期從事軍旅工作的心得、經驗與感想，並進一步從軍事的觀點發展成為經世治學的系統。

其次，諸子係指各派的代表人物，班固在編纂《漢書》曾經對諸子的學術分類做了初步的考證，認為「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但可以視之為學派的不過九家而已，「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即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¹³根據班固的統計，雖然「凡諸子百八十九家」，但真正可以被視為「一家之言」者，只有儒、墨、道等九家，而且在兵家並沒有被班固歸類為諸子，那麼是否意味著兵家並不是個學派，而只能視為一種專業知識。事實上，在東漢班固提出「九流十家」之前，司馬談就先提出了「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家）¹⁴，從這六家的分類可以發現，班固是延續司馬談學派分類的觀點，他是在這個基礎上在增加，縱橫、雜、農、小說家。

綜合諸子出於王官的觀點，本文初步發現學派是先從某些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發展到學科再到學派。王官為專業知識提供發展的環境，當王官流落民間之後，著書立說發展為系統性的知識即為學科，再由後世子

註10：李零，《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註11：傅斯年，〈戰國子家敘論〉。章太炎，《國學大師說諸子百家》（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55-81。

註12：張磊，〈《召壺》與周代司徒軍事職掌新論〉，《中國歷史文物》，第2卷，2010年，頁63-70。

註13：班固，《漢書·藝文志》。

註14：除了司馬談之外，《淮南·要略訓》、《莊子·天下篇》等也都有提出六家學派的分類觀點。

附表 歷代子部收錄兵家的概況表

朝代	作者	典籍	分類方式
東漢	班固	漢書·藝文志	六藝、諸子(儒、道、墨、名、法、陰陽、縱橫、雜、農、小說)、詩賦、兵書、數、方技
南朝	阮孝緒	七略	經典、記傳、子兵(諸子及兵書)、文集、技術、佛、道
隋	魏徵	隋書·經籍志	經、史、子(儒、道、墨、名、法、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歷數、五行、醫術)、集
宋	歐陽修 宋祁	新唐書·藝文志	甲部(經錄)、乙部(史錄)、丙部(為子錄,包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天文、歷算、兵書、雜藝術、事、經脈、醫術)及丁部
清	張廷玉	明史·藝文志	經、史、子(儒家、道家、雜家、農家、小說、兵書、天文、歷數、五行、藝術、類書、道家、釋家)、集
民國	趙爾巽	清史稿·藝文志	經、史、子(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道家、釋家)、集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整理。

弟發展成理論性知識即為學派，諸子雖然出於王官，但有些可能只有發展成學科或專業知識，最終不一定形成學術派別。這也就是諸子百家，為什麼到最後只有九家被班固視為學派的原因。另外，西漢時期司馬談認為只有六家稱得上學派，到東漢班固則增列為九家，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班固之所以會增加的縱橫家等四家，有幾種可能，第一是班固放寬篩選的標準，因此從六家增為九家，第二是班固仍依照司馬談的標準，但由於後續這四家思想發展成熟，已達列為學派的基準，因此，增列了四家，第三是班固採取與司馬談不一樣的檢視標準，使得從原來的六家擴增為九家。就第三點而言，如果是不一樣的篩選基準，那九家當中就不太可能六家完成與司馬談的分類一致，一定有所差異。也就是說他可能是放寬原有的標準或依然司馬談的篩選標準。雖然目前已無法考證司馬談及班固以什麼依據做為篩選學派的基準，但從學科的發展角度來看，很可能是由於後面四家思想發展成熟，因而才會被班固

加入到諸子的行列之中。基此分析，東漢以前兵家思想還未成熟到可以視為一家之言。

三、十家與學派

從編目學的角度，班固將學術派別收錄於《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之中，凡是未收錄者均不能被視為學派，只能稱得上是學科或專業知識。也就是說，從西周司馬之官，到春秋戰國官學派入民間，兵家的發展一直沒有被列入子集之中的諸子列，是由於司馬談甚至後來的班固認為兵家或許可以稱得上是門學科，但還不到達學派的境界，因此，司馬談與班固都沒能將之視之為學術派別。

如果從是不是被編入子部視為學派的依據，那南朝阮孝緒所著的《七略》開始就將諸子與兵書合為子兵錄，從《隋書·經籍志》開始採用經、史、子、集的劃分方式，兵家與儒家等其他十四種類別被編入子部當中，並解釋道「儒、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有所編；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各異。世之治也，列在眾職，下至衰亂，官失其守，或以其業游說諸侯，各崇所習，分鑣

并驚。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技之略，今合而敘之，為十四種，謂之子部。」¹⁵，一直到隋、唐、明、清(如附表)的官書都依據類似的編目原則，將兵家編於子部當中，也就是說，在班固編纂漢書以前，兵家的學說可能還尚不足以視之為學派，只能視為學科或專業知識，但從隋朝開始，豐富的兵學體系，已發展相當成熟，可以獨立視為學派。如果從兵家是否被列子部的諸子之列，做判斷兵家可否成為一個學派的基準來看。隋代之後兵家被列入子部之中，代表兵家發展已至成熟的地位，那麼從這點看來，兵家稱為一門學術派別應無庸置疑。

從春秋時期諸子百家的出現(大約西元前五百年)，到司馬談提出六家的學派分類，大約也將近六百多年，合理的推論是由於以諸子為首的儒、道、法等各家弟子，經過長期講學、著書與立說的過程，已經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學術理論，經脫離以往單純以職業為主軸的知識觀，發展成各具特色獨樹一格的思想體系，到了班固則更進一步精細的區分成九流十家。說明了學派化的發展的過程中，大多是經由後代子弟的逐次的補充，將各學說的思想加以系統化，這使得原來只承認六家，到後來擴增到了九家。當然兵學隨著時代的演進，進一步的從專業知識、學科，漸漸的形成有別於其他家的學術派別。因而，隋代以後將兵家納入子部當中，代表著兵家思想的體系化¹⁶。事實上，民初國學

大儒呂思勉就將兵家及方技納入九流十家之中變為十二家，獲得證明¹⁷。其次，雖然班固與司馬談並沒有把兵家列為入學派的分類之中，但班固卻在《漢書·藝文志》之中表示「兵家之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先前談到，班固將兵家與其他各家視為王官中重要的職守，雖然未列於十家之中，但由於篇目繁多，而且內容與其他各家有較大的差異。因此，將他列在子部的諸子之外，並不代表班固不認同兵家的學術地位。

總之，當初漢書將兵家排除在九流十家之外，並不能說明兵家在漢代以後沒有發展成一個學術派別。若依據編目的分類原則，隋代以後兵家即被列入諸子之列。其次，就早期編目的慣例，班固延續劉歆父子的七略當中的編目原則，將兵書與諸子分開編目，亦可說明班固沒有將兵書編入諸子略之中，並不能說明兵家不是個學派。另外，若將兵家是否列入諸子之列為基準，隋代以後兵家與其他各家共同列入子部之中，若依編目學的觀點，兵家在劉歆父子時期就已經具備學派的資格。

參、成一家之言

兵家被列入子部是否代表兵家是個學派？對此，學者有不同的見解。例如莊子就認為諸子各家雖然「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但多「不能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¹⁸也就是說，雖然有部分的學者以九流十家為學派的分類依據

註15：魏徵，《隋書－經籍志》。

註16：李桂生，〈兵家《尉繚》與雜家《尉繚》關係新探〉。

註17：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上海：東方出版社，1933年)。

註18：莊子，《莊子·天下》。

，但仍然有學者並不認同這樣的學派分類基準。如果姑且不論兵家被列入子部，是否能代表兵家是個學派。那麼要有什麼樣的資格才稱得上學派？

依照蔣伯潛的觀點各學派成立必須能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就是能提出與其他家不同的觀點，而且學說要具系統性。對此，司馬遷提出更嚴格的標準，他不僅認為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學說的內容要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¹⁹才能被視之為「成一家之言」。依照李桂生觀點「凡是能自立其說，並言之成理，有其統緒，能發為著述者。」²⁰兵家如果要能成一家之言，它不僅要有異於其他學派的觀點，還要能具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哲學素養，才能被視為成一家之言。以下就從「自立其說、言之成理」及「有其統緒，能發為著述」為分析兵家的架構，分述如下：

一、自立其說、言之成理

姜國柱認為兵家大事諸家皆察，例如《周易》、《左傳》、《尚書》、《詩經》、《周禮》等，著述內容大量論兵、談兵、察兵，甚至出現所謂的法兵家、儒兵家等，從諸子百家不同的觀點探討兵事，其中又以兵家最為專業與代表性。姜國柱認為兵家的觀點其實就是觀察自然所得出的哲學思想，將

觀察自然宇宙的變化與原理運用於軍事作戰之中，並將兵學系統化與理論化。例如，他認為《孫子》之中「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²¹以及「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陽，善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兵陵堤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²²有些是根據自然觀察所歸納出的自然哲理，有些則是根據社會運作或宇宙運行的萬物之理，雖然用於說明軍事作戰，但實質上是透過對自然的觀察，而演繹出來的原理原則。換言之，兵家不僅將兵學理論化及系統化，還進一步的將它哲學化。甚至，何炳棣認為老子的學說來自於孫子²³，老子樸素的思想觀係來自於孫子的觀點，可見兵家思想已達「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程度。因此，學者普遍認為兵書內容還涉及天文、地理、醫藥、占候等問題。這些透過自然觀察所形成的兵學原則，甚至可以運用在外交、政治以外的經濟及體育領域²⁴。

例如戰國時期兵家的代表人物吳起，他不僅是個軍事家也是位政治家，從吳起兵法當中可以感受到，吳起眼光不僅僅停留在強兵，他還進一步的將視野投向富國，他認為

註19：同前註，《諸子通考》，蔣伯潛，頁9。

註20：李桂生，〈從歷代兵書著錄看兵家的諸子學性質〉，《黃岡師範學院學報》第28卷，第2期，2008年，頁34-53。

註21：孫武，《孫子兵法·謀攻》。

註22：孫武，《孫子兵法·行軍》。

註23：請參閱何炳棣，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辯證思維產於「孫子兵法」的論證，《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澤厚也提出相同的見解，認為韓非子思想受老子影響，而老子思想係源自於孫子《孫老韓合說》收錄於《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77-105。

註24：柳玲，《中國古代兵書》（臺北市：臺灣商務，1994年）。

國富是強兵的基石，沒有國富無法做到強兵，因此，國富為強兵之基礎，而強兵又為外交及國際生存の後盾。例如吳起為魏國打下河西之地，使得魏國在戰略地理上得到天然的屏障。魏國地處中原核心，各國對外發展軍事交必爭之地，魏國能在強權環視之下存活下來並不容易，尤其面對極欲西進的秦國，魏國就成為秦國首要打擊對象。事實上，吳起奪取河西之地，魏文侯命治理河西。吳起不僅僅靠的軍事上的力量，他除了加強對軍隊的訓練之外，還進行多項政治、經濟與農業的改革，讓河西之地固若金湯，這才是秦魏交戰，吳起勝多敗少的重要因素。同時，吳起利用魏武侯巡視河西之地時，提醒魏王要親賢臣遠小人，否則空有良好的地理環境，遲早也會被敵人擊敗。事實上證明，兵家的觀點並不僅侷限於軍隊管理與指揮作戰。又例如，吳起離開魏國投奔楚國，開始被任命為宛平守，又升為令尹（相當於今天的行政院長）。吳起對楚國進行大力的改革，他以兵家的理念，嚴明的管理，縮減國家不必要的開支，廢除世襲貴族制，將以往貴族的封地改為郡縣制，並且行政部門精簡，撤換不必要的官吏，將剩下的預算強化國防建設，除了從行政制度與財政上著手之外，亦大力防杜社會和政治上浮誇的風氣，為楚國的強大奠定基礎，在外交上兼併陳、蔡二國，軍事上擊退韓、趙、魏聯軍，平定百越叛亂，並向西擴張，令秦國大為恐慌。可見吳子的軍事思想，並不僅止於運用於軍事戰略之上，甚至於運用在內政、外交上都具有一定的效用，因此，兵家思想不僅是能達到「

自立其說，言之成理」的境地，而且具有治國安邦的實質效用。

二、有其統緒、發為著述

《漢書·藝文志》當中兵書略共分為四部；兵權謀13家，259篇；兵形勢11家，92篇，圖18卷；兵陰陽16家，249篇，圖10卷；兵技巧13家，199篇。從漢初以來的史料中曾經記載的兵書大概近千篇，可見兵家學說在當時盛行的狀況，至於這些兵學是不是成一系統，還是各搞各的，只是針對軍事作戰的觀點提出不同的見解。根據明代人茅元儀在評價《孫子》一書時說：「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孫子》可以稱得上兵家學說之集大成者，雖然，後世的兵家與孫子沒有明顯的師承關係，但他們的學說都是在《孫子》思想的基礎上發揚。例如《漢書·藝文志》將兵家細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等四類。他認為兵權謀家係指「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注重軍事戰略研究，兼通形勢、陰陽、技巧各派之長。兵形勢家，特點為「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注重戰術研究，探討軍事行動的運動性和戰術運用的靈活性。兵陰陽家，特點為「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注重天時、地理條件與戰爭關係的研究，多陰陽五行，甚至迷信內容。兵技巧家，特點為「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注重軍事裝備與軍事技術的研究。可以說是在《孫子》思想的基礎上融合各

家學說演變而成的兵學系統。

根據黃樸民的考證，宋代編纂的武學官書—《武經七書》，《孫子》以外的六部兵書，內容均延續《孫子》的觀點。余一鳴以《對問》兵書的內容為例²⁵，分析發現唐太宗與李靖於書中共用孫子或孫武一詞多達31次，顯見《孫子》對後世兵書的影響，印證了「古代兵學者，無出孫子矣」的觀點，歷代兵學係源自於兵家的《孫子》，並形成特有的思想體系。換言之，雖然孫武沒有像孔子有多達三千個弟子，提供學術發展可長可久的基礎，但兵家以《孫子》為核心的思想特色，可以說明兵家的系統性，同時多達千部的兵學著述均脫離不了《孫子》思想的範疇，說明了兵家「有其統緒，發為著述」。其次，兵家雖然不像孔門弟子三千，但孫臏、龐涓、張儀、蘇秦受業於兵家鬼谷子，可見兵家功利思想雖然不見容以儒家仁義道德為主體的社會當中，但這並不意味著兵家在以儒家為主體的社會當中毫無發展空間，從零碎的歷史記載之中，我們仍得知兵家仍有如鬼谷子這一類的人物，傳承著兵學思想。前曾述及，孫武被尊稱為孫子，吳起被尊稱為吳子，其他的兵學家如鬼谷子、尉繚子，這些都是後世子弟對師長的尊稱，即使是弟子對師長的尊稱，那麼兵家雖沒有孔門弟子三千，則尊稱上也可以看出，當時兵家的各門各派仍有不少弟子。同時，從漢書以後的斷代史，兵書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分類範疇，而且歷代的兵書不斷推陳出新。可見兵家亦達到「有其統緒、發為著述」的標準。依照

李桂生的嚴格標準來看，兵家不但「發為著述，有其統緒」，而且還「自立其說、言之成理」，甚至具有具體實踐的可能，顯見兵家已達到「成一家之言」格局。

肆、兵家思想的代表

既然兵家可以稱得上是門學派，誰最足以代表兵家思想，或是說誰的著作足以代表兵家。其次，身處於儒家思想為主的社會當中，兵家難免受其影響，那麼考證兵家思想的代表著作，必先瞭解儒家思想什麼時候滲透過兵家，再從這個時期往前推，便可得到較為精確的答案。因此，本文考證的方式，不是從兵家的內涵著手，而是從歷史考證的角度探討各兵書的成書年代，以找出足以代表兵家的經典著作。

一、兵家的誕生及發展

雖然，班固的九流十家當中，並沒有這個學派，但就社會發展的情況來看，周王權力式微，無法維護國際秩序，各國力圖富國強兵，在維護國家安全的需求下，專業軍人逐漸形成，尤其各諸王相互爭奪霸主過程中，追求國家富裕及強大的軍事實力，就成為霸主爭奪戰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那麼首先要被需求的必定是專業的軍事家與將領，爾後再漸次的形成專業的兵種及士兵。因此，兵家並不在班固春秋學術流派的分類當中，只能被視為學科或軍事專業知識。但就社會發展的分工而言，掌管軍事事務的「司馬」，發展成後來的軍事家，就成為理所當然之事。在今本《司馬法》與佚文當中亦有「兵家

註25：余一鳴，〈先秦傳統價值與兵學思想—以孫子兵法為例〉，《復興崗學報》，第83卷，2005年，頁381-410。

者，蓋出古司馬之職」，根據李零的研究，古代司馬一職與《司馬法》所記載的內容非常相近，因此他認為古代的軍事學最初就是建立在職業性知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內容圍繞軍事組織、軍隊訓練等軍事專業問題²⁶。且漸次的形成以軍事為核心的學術思想。

根據趙國華的考證「兵家」大概成形於春秋戰國²⁷，這股專業化的思想一直延續到東漢初年，兵家仍維持特有的專業思想，後來則受漢代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影響，儒家漸為中國文化核心，並滲透至生活與思想各個層面。張瓊及高潤浩認為漢以後的兵家思想漸為儒學所滲透，使得兵家思想中參雜儒學的觀點²⁸，所以，漢初以後的兵學著作多少均雜染儒學思想。余一鳴認為儒家思想雖不是中國文化的全部，但以儒家思想做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實不為過²⁹。中國古代兵書雖全非儒者之作，但刪削、篩取、選定卻出自於儒者之手，儒學不僅在中國學術佔有主導地位，更影響生活各個層面。韋政通認為以儒家文明為主體的泛道德主義社會，瀰漫於整個中國社會，具體於一切生活領域當中³⁰。儒家思想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當然也包含對兵家思想及其發展。根據崔乃鑫的分析，兵家與儒家雖然同樣誕生於先秦，兵家伴隨頻繁戰事應運而生，儒

學在諸子百家紛爭中取得獨尊的歷史定位³¹。隨著歷史的發展，兵儒之間從矛盾對峙，逐漸走向融合，最終形成「以儒統兵」的格局，儒家的義戰、民本等思想深入兵學之中，對兵學產生深遠之影響。因此，高潤浩進一步表示兵學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受到儒學不同程度的影響³²。在儒家思想長期主導的情況下，使得兵學不得不臣服於儒家仁義道德之下，以道德修養做為戰爭行動的引導，並做為戰爭行動合理化的基礎。

就文化發展的觀點而言，先秦以後的兵書大多雜染了儒家的色彩，因此，並不能全然代表兵家的想法。因此，本文有必要將兵家思想的代表經典限制在先秦以前的兵書，先秦以後的兵書很可能因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導致兵書內容有兵之形而無兵之實，使得兵在以儒家仁義為主體的思潮之下發展失去了主體性。那麼如何從漢初以前的兵書找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又有哪些兵書是足以代表兵家的觀點。歷代以來，兵書經過幾次重大的整理，其中司馬遷的《史記》及班固《漢書》，就針對兵書進行有系統的刪修，其中又以宋代時期武經何去非，篩選七本最具代表性的兵書，編成《武經七書》，其中包含《孫子兵法》（以下簡稱《孫子》）、《吳子兵法》（以下簡稱《吳子》）、《六韜》、《黃石公三略》（以下簡稱《三略》）、《尉

註26：李零，《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註27：趙國華，《中國兵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9。

註28：高潤浩，〈以儒統兵：儒學對傳統兵學的統合〉，《中國軍事科學》，第16卷，第1期，2003年，頁122-130；張瓊，〈以「武經七書」的軍事文化特色看古代兵學儒學化〉，《中國軍事科學》，第14卷，第4期，2001年，頁114-119。

註29：余一鳴，《我國軍人核心價值之研究：理論建構與實證分析》（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研究所，2005年），頁87。

註30：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臺北市：水牛出版社，1994年），頁164-167。

註31：崔乃鑫，〈中國古代兵儒的對立與交融〉，《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2期，第2卷，2010年，頁70-72。

註32：高潤浩，〈以儒統兵：儒學對傳統兵學的統合〉，《中國軍事科學》，第16卷，第1期，2003年，頁122-130。

繚子》、《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對問》(以下簡稱《對問》)等。同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兵書，也是兵學研究重要的史料，其中除了上述兵書之外，還包括了《孫臏兵法》。以下就針對這幾部兵書進行考證，主要著重於作者的背景及成書的年代，瞭解該書是否足以代表兵學思想或已雜染儒家或其他家的觀點，無法視為兵家代表著作。

二、孫子

(一) 其人其事

孫子是否有其人或是孫子就是孫臏，曾經是個歷史疑案，例如葉適在《習學記該序目·孫子》云：「穎考叔、曹凱、獨之武、專諸之流，微賤殘暴用事者，左氏未嘗，而武功名章灼若此，乃更闕；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認，仍獨不及武耶？…左氏無孫武此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接著又於說「左氏無孫武…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適。」足見歷史上對孫武其人乃有疑義。明代宋濂反駁說「葉適以不見載於《左傳》，疑其書仍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予獨不敢喟然。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年之間，大國者秦楚，小國者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³³杜預則直接從《左傳》記載反駁葉適的觀點，他認指出《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師及齊師戰於炊鼻…冉豎小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

君子白晳須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中的「子彊，武子字。」³⁴文中所指的武子仍是指陳武子。根據《史記》的記載，春秋末齊國陳、田、孫三姓，其源一也。也就是武子其實指的就是孫武子，亦就是孫子。

由於不同意見各持一詞，直接的證據要到1973年中國大陸銀雀山一號漢墓中考古發現，才證實孫子確有其人，而且孫武與孫臏實為不同人，前者史稱吳孫子，後者為齊孫子。孫子實名為孫武，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人，生卒年不詳，大致與孔子同時。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的記載：「他是齊國田完的后裔，因祖父田書伐莒有功，齊景公賜姓孫氏。」因十三篇見吳王而發跡，《孫子》在歷史上的地位及影響，可以從中得到印證。《史記》記載，孫臏、趙奢、韓信、黥布等人，更是直接以《孫子兵法》來指導戰爭，取得輝煌的戰果。事實上，孫子所著的十三篇早在戰國時期就威名遠播，《韓非子》一書中曾經談到「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有之。」³⁵漢朝的《孫子兵法》更成為官訂的武學教科書，隋唐時期《孫子兵法》的地位被尊為兵聖。近代孫中山先生更說，「就中國歷史來考究，二千多年的兵法，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為中國的軍事哲學。」因此明代茅元儀就說：「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³⁶可以說《孫子兵法》就是中國兵學思

註33：張心澂，《偽書通考》(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39年)。

註34：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註35：韓非子，《韓非子·五蠹篇》。

想的代表。

(二)成書年代考

雖然中國大陸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證明了孫武的存在與孫武及孫臏實為不同人，但說明了《孫子》最晚在漢初就存在。就目前的史料來看，大概成書於春秋末年，而內容是記載孫武的兵學觀點。因此，兵法的作者可能是孫子本人或是孫子的弟子。根據《史記》中的記載「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勤兵乎？而銀雀山漢墓的孫子兵法竹簡當中也明確寫著「吳王問孫子曰…」等語。其次，先秦時期的《呂氏春秋·上德》中有「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的記述，漢代高誘對《呂氏春秋》這段話的解釋是「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³⁷而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亦出現，「吳王問孫子曰」等語足以說明，《孫子》的內容記載的確是與孫武有關言行，而且成書的時間大概就是他見吳王之前。也就是吳王闔廬的身處年代，約西元前514至496年(春秋末年)，那麼不管闔廬起用孫武時孫武的年紀如何，這本兵書大概不脫這個時間。

三、吳子

(一)其人其事

先前談過《韓非子》談過戰國時期孫吳之書遍天下。與這位兵聖相提併論者就是戰國初期的吳起。吳起成名的非常早，他在青年時期就曾在魯國為將，以少勝多打敗北方的強權齊國。不過真正使吳起名揚於世，是在於魏國任職時的「擊秦，拔五城。」³⁸使魏國西線的邊界得到擴張，並開闢西河郡，使魏國在西邊的國防得而穩固，且消除秦國的威脅。根據史料的記載吳起在任西河郡守的廿多年的時間，「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³⁹使得魏國「辟地四面，拓地千里。」⁴⁰而且「令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⁴¹尤其在魏武侯9年，吳起被任命為伐齊大將(西元前338年)，一直打到齊國的靈丘⁴²。在戰國的中期，魏國能居於霸主與吳起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的貢獻有直接的關係，而不僅將兵學運用於作戰之中，也運用於國家政治與經濟的改革上，是續孫武之後另一位卓越的兵學思想家與理論實踐者。

(二)成書年代考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可見在西漢時期吳子兵法相當普遍，而且這種普遍的現象，是從戰國時期就已存在。前曾述及《韓非子·五蠹篇》的「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家有之。」其中的吳即指《吳子兵法》，可見《吳子

註36：茅元儀，《武備志·兵訣評》。

註37：呂不韋，《呂氏春秋》。

註38：司馬遷，《史記·孫吳列傳》。

註39：《吳子兵法·圖國第一》。

註40：《吳子兵法·圖國第一》。

註41：司馬遷，《史記·孫吳列傳》。

註42：司馬遷，《史記·魏世家》。

》並沒有因為秦代焚書的影響。另一方面，從《韓非子》成書年代大約是在西元前255年至247年之間來看，《吳子》能夠被他記載，必定是早於這個時間。不過《漢書·藝文志》記載《吳子》為48篇，與今本的6篇明顯不同。因此清代考據學家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張心澂的《為書通考》與黃云眉的《古今偽書考補證》均認為今本《吳子》是偽書，他們普遍認為兵書的內內容過於空泛，且文字的使用習慣與戰國時期有明顯的差異。根據徐勇的考證，今本《吳子》的內容與《尉繚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史記》等書中記載的如出一轍，不謀而合。他因此推論今本的《吳子兵法》6篇雖然經過後人的輯佚重編，但是其主要的內容和基本思想仍然可以看成是吳子，可視為研究吳子軍事思想的主要依據⁴³。

四、尉繚子

(一) 其人其事

尉繚子是指人名還是一個官職，目前尚無定論。這也使得《尉繚子》這部兵書的作者到底是誰出現不同的說法。前者根據《尉繚子》開篇就有「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的內容，認為尉繚是戰國末年梁惠王時期的一個人名(梁惠王又稱為魏惠王)。根據《尉繚子》的記錄，既然尉繚曾經跟魏惠王論兵，那麼他就應該是那個時代的人物。而後者的說法是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秦王嬴政10年(西元前237年)，大

梁人尉繚來到咸陽遊說，為秦王謀劃統一事宜，被始皇封為「國尉」。根據錢穆的考證，他認為《史記》記述尉繚到秦國謀職這段歷史非常不可靠，他認為尉繚的尉是官名，但梁惠王時期的尉繚與秦嬴政時期的尉繚分屬不同的人。徐勇更進一步從身處時間的差異分析，認為梁惠王最後一年與秦嬴政十年相隔近80年，不可能是同一個人⁴⁴。不管史記的說法是否正確，可以確信的是尉繚是先秦以前的人物。

(二) 成書年代考

既然誰是尉繚並無法確定，但可以確定《尉繚子》是先秦以前的作品。徐勇分析認為《尉繚子》同許多戰國時期的作品一樣，並非一部系統的專著，而是由尉繚或其弟子根據他的言論在不同時期寫成的幾十篇作品的合編。最初大約共有60篇，其中29篇的內容雜取了其他學派的觀點，且有雜家的色彩，也因此到了漢代就被劉歆、班固等列在「雜家類」，而另外31篇適應戰國晚期形式、類似軍令實錄的作品，就被任宏、班固等列在了「兵形勢家類」。東漢以後，《尉繚子》逐漸佚失。到了宋代《尉繚子》被編入《武經七書》之中，成為官訂的教科書，而原雜家部分和原兵形勢家部分的古本《尉繚》，因不受重視而失傳了。在今本《尉繚子》24篇中，前12篇屬於原雜家《尉繚》的內容，後12篇為原兵形勢家《尉繚》的內容⁴⁵。

《漢書》分別在雜家與兵家當中均有《

註43：徐勇，〈《吳子》的成書、著錄及其軍事思想〉，《軍事歷史研究》第3期，2001年，頁142-148。王曉衛則認為曾有人疑吳子為偽作，但今學者一般認為可能性不高。請參閱，王曉衛，《兵家史話》(臺北市：國家出版社，2004年)，頁25。

註44：徐勇，〈尉繚子的成書、著錄及其相關問題〉，《中國哲學史研究》，第1期，1986年。

註45：徐勇，〈《尉繚子》是如何流傳與演變的?〉。徐勇、喬國華及余新忠，《兵家文化面面觀》(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

尉繚子》的記載，因此出現《尉繚子》是兵家還是雜家的爭論，不過深入分析後可以發現，其爭論在於《尉繚子》共有雜家及兵家兩種不同的版本傳世，而內容亦有其差異，因此，史學界爭論的是兵家《尉繚子》與雜家《尉繚子》的關係。根據鄭良樹(1996)的比較分析，認為史學界對於兵家或雜家的看法大概有，不同時代不同人所寫的，同時代同一人寫的不同內容等，但均有被質疑的空間。後來根據李桂生(2006)的考證，認為漢代流傳的雜家或兵家的《尉繚子》，實源自於戰國時期兵家的《尉繚子》，同時，所謂「雜家」，其實就是雜取各家思想而成，因此，《漢書》將兵家的思想歸入為雜家之中並無不可，再說，以早期的分類制度並不嚴謹的狀況下，再加上從九流十家的學術分類之中，可以發現兵家雖然可以視為當時重要學派之一，但並不是學術主流。因此，徐勇就認為將部分《尉繚子》的內容歸入雜家當中，並不影響《尉繚子》做為兵家代表作的地位⁴⁶。

五、其他

對於武經七書中各兵書的成書時間各家說法不一，不過從銀雀山漢墓考古挖掘中，發現的幾部兵書中除了《孫子》之外，還包含《六韜》、《尉繚子》、《孫臏兵法》等

先秦兵書，上述兵書均成書於西漢初年以前，然而，由於孫臏兵法已殘缺不全，且內容多與《孫子》觀點相似，因此，將其排除在外。另外，《六韜》兵法雖然由考古確認成書於西漢以前，但班固在《漢書》將部分歸類於道家及儒家之中。雖然，目前仍無法確認《六韜》的作者，不過就班固的觀點，他並不是純然兵家的觀點，或者可以說是從道家或是儒家的觀點談論軍旅之事。相傳《六韜》由姜太公所著，歷史上對《六韜》作者的考據歸納大概區分為，姜望撰說；非姜望撰說；姜望撰後人增補；偽托姜望撰說，不過楊朝明認為這些都是根據目錄學的觀點進行分析，他強調不管《漢書藝文志》或《隋書經籍志》記載作者為何，都不足以證明《六韜》作者及成書時間，因為他認為班固編撰漢書已距姜望一千多年，更何況隋書記載《六韜》為姜望所作⁴⁷。根據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六韜》竹簡顯示，《六韜》成書時間最遲在西漢以前，精確的來說竹簡大概成書在漢文、景至武帝初期，正好是落在董仲舒提倡「獨尊儒術」的時期。

此外，《武經七書》當中，還有其他三部《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及《李衛公問對》等，其中《李衛公問對》是唐太宗與李靖針對軍事問題的對話錄⁴⁸，又稱《唐太

註46：徐勇，〈《尉繚子》是如何流傳與演變的？〉。徐勇、喬國華、余新忠，《兵家文化面面觀》（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

註47：徐勇，〈《六韜》大致成書於什麼年代？〉。徐勇、喬國華、余新忠，《兵家文化面面觀》（濟南：齊魯書社，徐勇認為應該在成書於戰國時期，2000年），頁88-91。

註48：《李衛公問對》一書之真偽，主要爭議在於宋人陳師道認為該書為「阮逸偽托說」，原因在於根據《武經七書》的記載該書的作者是對話中的主角李靖，但在《新唐書》當中記載著李靖七部兵書，但獨缺《李衛公問對》，據此陳師道提出「阮逸偽托說」，雖然歷史上對「阮逸偽托說」有著正反不同的意見，但根據王斌檢視以往正反的不同意見，托古之說基本達成共識。請參閱，張固也、王斌，〈阮逸偽托《李衛公問對》說質疑〉，《中國典籍與文化》，第1期，2010年，頁58-63；于汝波，〈關於《李靖問對》的成書時間及主要理論建樹〉，《軍事歷史研究》，第3期，1998年，頁129-135。

宗李衛公問對》簡稱《唐李問對》，雖然成書時間或有不同見解，但從對話中的主角可以確定，《唐李問對》係唐代或唐代以後的作品。同樣地，《黃石公三略》成書於東漢，根據史記的記載黃石公即為圯上老人，根據王陽明考證「黃石公三略，舊題黃石公撰，即圯上老人授張良著，文義不古，非秦漢以前書，疑為後人冬托」⁴⁹，不管是否為後人偽托，它成書時間無疑在東漢後期，而且是一部以黃老思想為主體的兵學著作⁵⁰，依照上述的篩選規範排除於兵家代表著作之列。

《司馬法》是否為偽書，在歷史上也經過數次的反覆辯論，正反雙方各執己見，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記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這是有關《司馬法》最早的記載，從簡短的記述中大概可以瞭解，司馬遷認為《司馬法》是古代君王對軍隊的軍紀規範，由於這是古制當中對軍隊或軍人行為的規範。同時司馬遷在《司馬穰苴列傳》當中說「用兵行威，大放司馬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感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⁵¹。可見《司馬法》並非出自於一人之手，他起初可能是軍隊法令規範之類的文書，但到東周以後這套軍事規則不再受到後人的重視，被逐漸遺忘，只剩下少數人知道它的內容，到後來由司馬穰苴根據個人的理解加以補充，依據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分析，《司馬法》大多已散失

，後來5篇的《司馬法》其實是後人偽造⁵²。同時王震認為今本的《司馬法》雜染各家思想，並不存然是兵家觀點，據此將該書排除於外兵家代表著之外。

伍、結語

從上述的探討中可以瞭解，兵家指的並不是一種職業分類，它不僅指的是兵學家或軍事家，而且是一種學術思想或學派，雖然，兵家不在班固的十家九流分類當中，但兵家名列諸子百家，應無疑慮。然而，如果說兵家是一種流派，這個說法也不盡然正確，應該說春秋以前的兵家是個學科，而春秋之後的兵家，由於社會階層及專業分工的成熟，使得兵家思想體系燦然大備，足以成一家之言，使之成為一門學派。然而，先秦之後的兵學觀點，受到傳統儒家思想影響，形成「兵學儒家化」的現象。這使得誰足以代表兵學思想只能限定在春秋至東漢期間的兵學著作中去找尋。本文即透過歷史的考證，發現兵家初期只能稱得上是門學科，但在春秋以後時期逐漸形成以軍事為主軸的學派觀點，其中又以《孫子》、《吳子》及《尉繚子》等三家最足以代表兵家思想。



作者簡介：

余一鳴上校，政治作戰學校39期，政治作戰學校政研究所碩士暨博士，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任助理教授。

註49：何去非，《武經七書》。

註50：黃樸民，《刀劍書寫的永恒：中國軍事文化散論》（北京市：國防大學出版社，2002），頁388。

註51：司馬遷，《史記·司馬穰苴列傳》。

註52：黃云眉，《古今冬書考補正》（濟南市：齊魯書社，1980），頁178。